

婚姻平權議題之支持方與反對方的心理特性差異：以字詞分析為取向*

林瑋芳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黃金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

李怡青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婚姻平權法案是近年臺灣社會受到高度重視的社會議題，透過全民的積極參與發聲，支持方與反對方雖多有機會交流彼此的想法，目前仍無法形成共識。針對支持方與反對方的衝突磨合，本研究嘗試透過字詞分析的角度切入，以字詞使用頻率表徵個體的心理特性與思考歷程，探討支持方與反對方在人我界線、動機歷程及認知特性上之差異。研究一蒐集 60 篇與婚姻平權有關之媒體投書和報導，支持與反對立場文本各半，以檢驗支持方與反對方在字詞使用頻率之差異；研究二則以研究一之特定字詞使用頻率，透過羅吉斯迴歸檢驗立法院公聽會發言人對婚姻平權法案之立場為支持或反對之預測力。研究結果大致與研究假設相符，意即相較於反對方，支持方較不以伴侶性別為同性或異性，畫分明確的內、外團體，更傾向將所有個體一視同仁；也較容易受到強化社會關係聯結之趨動，而較不重視權力關係的鞏固；在論述表達上，亦呈現較高的認知複雜度。據研究者所知，本研究為國內少數以字詞分析研究取向，探討婚姻平權法案之支持方與反對方，在心理特性與思維特性上之差異的實徵研究論文。期能透過本研究拋磚引玉，從人我關係、動機歷程及思維特性的角度，嘗試理解支持方與反對方的歧異，因瞭解而更能有效對話溝通，早日實踐真正平等的社會正義。

關鍵詞：字詞分析、婚姻平權法案、動機歷程、認知歷程

* 1. 本文通訊作者：黃金蘭，通訊方式：clhuang@mail.ntust.edu.tw。

2. 本研究獲科技部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33-005-MY3 與 MOST 108-2410-H-011-013-MY3），謹此致謝。

臺灣婚姻平權運動肇始於 1986 年，祈家威先生公開出櫃，並至立法院爭取同性伴侶結婚權益。2017 年 5 月 24 日，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釋憲案，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別伴侶結婚的權利，係屬違憲。此案並命令相關機關應於兩年內修正或制定相關法律，逾期未完成，則相同性別二人得依民法婚姻章之規定結婚。保障同性婚姻的「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正式施行。此一釋憲案及後續的施行法，讓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伴侶可合法結婚的國家。從暗櫃躲藏到憲法保障，長路迢迢，這一步，臺灣人民走了三十多年。然而，依據 2018 年公投第 10 案「民法限定為一男一女」與第 14 案「以民法保障同性婚姻」（中央選舉委員會，2018）兩案之投票結果，顯示多數臺灣民眾對於婚姻平權法案仍持相對保守的立場，傾向反對以民法保障同性婚姻權利。縱使在法制面，同性婚姻已獲得實質的法律保障，但反對的聲浪仍是波濤洶湧，社會上還是充斥著各種對同志和同性婚姻的誤解、批評甚至歧視，未能真正落實婚姻平權的社會正義。

然若以心理學的角度切入，進一步思考個體對婚姻平權法案的立場，關切的焦點就不再只是單純的「贊成」或「反對」，更重要的是，個體所持立場背後的思考歷程和心理特性。是故，本研究即以字詞分析的研究取向切入，嘗試探討贊成方與反對方在心理歷程上之差異。

（一）婚姻平權法案的推動脈絡

婚姻平權法案在世界各地的推動，都是一場漫長的說服歷程。特別是在早期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異常」（abnormal），視其為一種精神疾病。雖然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早已於 1973 年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除名，但是整體社會氛圍仍對同志族群抱持負面刻板印象。以美國一般社會調查資料庫（General Social Survey）的研究為例，研究結果發現從 1973 至 1991 年之間，逾 7 成的民眾認為同性戀是錯誤的（Loftus, 2001）。而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研究結果亦得到類似結果。在 1989 年，有 58% 的臺灣民眾「不同意」同志伴侶有結婚的權利（瞿海源，1999）。顯示早期保守的社會風氣確實相對不利於同志族群。

近年來隨著婚姻平權運動的興起，相關人士與社會團體鍥而不捨的努力下，在 2013 年，臺灣已有超過五成的民眾認為同志伴侶應享有結婚的權利（章英華，2015）。2017 年的大法官釋憲案，更進一步保障了同志伴侶結婚的權利，使臺灣在婚姻平權的進展上，成為亞洲國家的先驅。然整體而言，社會風氣雖日趨友善於同志族群，由一夫一妻結合形成婚姻的傳統觀念仍根深蒂固，使得婚姻平權法案的推動，依舊受到許多的衝擊和困難。

在臺灣，婚姻是以異性戀為主體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在法律層面，民法婚姻章所保障的夫妻是由一男一女結合的關係，奠定了異性戀為主體的婚姻基礎。在心理層面，性別分工的傳統價值也形塑了個體對家庭概念的看法。傳宗接代是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過去由男性負責經濟工作，女性負責家庭照顧的傳統刻板印象深植人心，進而影響了個體對同性婚姻的接受程度。早在 1970 年代的研究即指出，固著的性別角色分工態度，是影響個體對同性戀態度的重要因素。越傾向認同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個體，對同性戀伴侶的態度越負面（MacDonald et al., 1973; Weinberger & Millham, 1979）。另一方面，對於同志族群負面印象，亦降低了個體對婚姻平權法案的認同程度。保守團體主張同志族群的性關係複雜，進而造成愛滋病的傳染散播，且由於同志無法自然生育，恐造成少子化現象更為劇烈。這些對於同志族群的污名化標籤，容易讓同志感覺自己被社會排斥，造成心理壓力，進而影響其心理健康。李怡青（2020）以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所進行的研究也指出，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和夫妻家庭樣貌，皆能顯著預測個體對婚姻平權法案的立場。當個體對同性戀存在越高的負面刻板印象，越認同一夫一妻為主體的家庭結構，其對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度越低。性別亦是預測個體對同志態度的重要變項。張德勝等人（2013）的研究指出女性對於同志群體的友善程度與接受程度顯著高於男性。此外，宗教信仰的力量也是影響著個體對婚姻平權法案的態度與立場。在基督教、天主教及回教等宗教教義中，皆有提及反對同性戀的相關論述。過去回顧型的研究也發現，虔誠的宗教信仰是預測同婚議題立場的重要指標（Herek & McLemore, 2012）。在臺灣社會也有類似的發現，部份反同團體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強烈主張同性婚姻合法化恐將壓迫宗教自由。Cheng 等人（2016）的研究也發現，雖然在 1995 年時，不同宗教支持者對於同志的態度無明顯差異；但隨著社會風氣日趨於友善同志，後續在 2006 年與 2012 年的調查中，卻發現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信

徒明顯對同志抱持更負向的態度。

綜合上述討論，臺灣婚姻平權運動經過多年的努力，雖然已有初步的成果，但仍是極具爭議的公共議題，支持方與反對方仍在互相說服的磨合階段。針對婚姻平權議題，過去相關領域已累積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包含探討性別、年齡、價值觀、角色態度及動機歷程等，都能顯著預測個體對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程度。但尚無文獻以字詞分析的研究取向切入，探討支持方與反對方在語言使用上的特性差異，以表徵其內在心理歷程的不同。為了補足此一研究缺口，本文採取字詞使用頻率作為語言標記之研究派典，比較支持方與反對方在表述婚姻平權議題時之字詞使用差異，分析其心理歷程之特性。

(二) 字詞分析研究取向

語言和文字的使用，除了在語意上傳遞訊息，達到溝通的目的，個人如何使用語言，予以組織整合，也反映了個體內在的思維、想法、價值及動機等心理歷程。對於豐富的語言文字呈現之文本資料，要如何應用於量化研究？在心理學的領域主要有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為內容分析，由評分者仔細閱讀內容，斟酌前後文章脈絡，依研究者給予的標準或評分向度予以分類或評量其主觀感受。例如葉寶玲等人（2010）即曾針對 1967 年至 2007 年間，發表在教育心理學報的所有研究論文進行內容分析，探討歷年來的趨勢變化。內容分析研究取向的優勢在於能夠捕捉特定脈絡下精緻的心理歷程，經常應用於分析不同類型的訪談資料和逐字稿（王櫻芬等人，2019；林淑君、王麗斐，2015；曾怡茹、林正昌，2015；陳湘芸、許維素，2020）。但是此種研究方法相對耗時費力，且可能遭遇評分者信度較低的問題（Graybeal et al., 2002; Pennebaker & Francis, 1996），進而影響後續分析的效果。另一派學者則主張以字詞使用頻率作為語言標記（marker），強調個體對於自然語言的使用方式，形成了個人特殊的語言風格（language style），也顯露了其心理特性。語言使用頻率本身即具有特定意義，個體選擇使用哪些字詞，即指涉了不同的心理狀態（Pennebaker et al., 2003）。

以字詞使用頻率為語言標記的研究派典，輔以配套之電腦程式（例如：語言探索與字詞計算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簡稱 LIWC），展現了快速分析大量文本資料的優勢，目前已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Tausczik & Pennebaker, 2010）。在搭配不同語言版本的字典後，更可適用於分析各國文本資料，目前已經有德文、西班牙文、韓文、義大利文等多國語文版本的 LIWC 詞典建立完成。中文版的 LIWC 詞典（簡稱 C-LIWC）也在 Pennebaker 教授的授權下，於 2012 建立並正式發表（黃金蘭等人，2012），為分析華文使用者之心理特性，建立了良好的研究工具。

心理特性之測量常用自陳式的心理量表，最為人詬病的就是社會讚許的影響，使得個體未必會在一般問卷測量中坦率勾選自己的真實樣貌。此外，採用自陳式量表雖名為自陳，實乃依據研究者提供的問題進行是否或程度性的勾選，未必能展現個體心理特性或態度的全貌。LIWC 這類以字詞使用頻率為指標的研究取向，則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分析方法，可能減低上述自陳式量表的問題。一來因為 LIWC 分析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語言使用，係使用者本身自發的行為表現，更能直接反映書寫者或說話者當下的思緒特性（Pennebaker et al., 2003）。再者，LIWC 所計算的是字詞的使用頻率，而非其所表述的具體內容。有別於過去文本分析注重傳遞訊息的「內容詞彙」，LIWC 尤其重視容易受人忽略的功能詞（或稱虛詞）。功能詞通常用於連接組織詞彙，形成完整的句義以表達訊息。雖然不具有實質的內容意涵，卻更能突顯個人的語言風格，也較不易受到意識操弄的影響，對於個人的行為反應和心理狀態更具預測力（Chung & Pennebaker, 2007）。例如，從代名詞的使用上，研究者發現個體在言談中使用更多的「我」，反映其自我聚焦的特性；使用越多的「我們」，越少的「我」、「你」、「他」，即代表其與他人形成共享認同的（share identity）的程度越高（Tausczik & Pennebaker, 2010）。又如，介系詞的使用標記說話者對事物提供了更複雜或具體的訊息（例如，在書桌旁邊的椅子掛著的袋子裡有家裡的鑰匙）。在期刊論文中，綜合討論要整合研究發現並與過去研究做出區辨與統整，常是全篇論文語句最複雜的部分。Hartley 等人（2003）就發現綜合討論使用的介系詞顯著高於摘要或序論所使用的介系詞。從上例可見，採用 LIWC 研究取向更在意的是個體「如何說」，而非「說了什麼」。「說了什麼」通常會隨著情境脈絡和主題對象，而有很大的不同，但「如何說」說則相對穩定，不易受到意識操弄的影響，更能凸顯說話者的心理特性與內在思維。

因此，本研究嘗試採取 Pennebaker 研究團隊發展之 LIWC2015 程式（Pennebaker, Booth et al.,

2015) 與依據 LIWC2015 詞典 (Pennebaker, Boyd et al., 2015) 中文化之 C-LIWC2015 (林瑋芳等人, 2020), 以特定詞類使用差異, 捕捉支持方與反對方的心理特性。有鑑於過往針對婚姻平權議題之新聞與網路言論分析研究, 皆發現反方的論述基礎多在於鞏固既有的婚姻結構和傳統價值, 並在既有的異性戀婚姻觀點下, 強調同志族群為非我族類的外團體 (葉德蘭, 2016; Jowett, 2014; Lee & Lin, 2020), 且婚姻平權的議題論述, 本涉及雙方相互辯論與捍衛個人立場的說服歷程。據此, 本研究聚焦於人我界線 (內、外團體畫分)、動機歷程 (權力結構或社會聯繫) 及說服歷程三個角度。

(三) 人我界線的分野

婚姻平權法案旨在保障同志族群的權益, 個體如何看待自我與同志族群之間的關係, 很可能會影響其對婚姻平權法案之立場。依據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 當個體感覺自己的內團體權益受到威脅時, 會產生防衛性, 強化內團體偏私行為, 貶抑外團體以保護內團體之利益 (Tajfel & Turner, 1986)。Schmitt 等人 (2007) 的研究也指出, 以「婚姻」一詞保障同志伴侶結婚的權利, 容易讓異性戀群體感覺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 使其產生防衛性, 進而更強調內團體 (異性戀族群) 與外團體 (同志族群) 的差異性, 明確劃分內外團體的界線。他們的研究也呼應了臺灣社會的現況, 部份反對者主張另立專法來保障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 避免使用現行民法, 即是內、外團體清楚區辨的體現。相對的, 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者, 較不以伴侶的「性別」作為劃分的標準, 而傾向將所有個體一視同仁, 不區分同性戀或異性戀族群, 主張婚姻是基本人權之一。

在字詞分析的指標中, 人稱代名詞廣泛地用於表徵個體的注意力焦點。當個體使用越多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如, 我、自己), 代表個體自我投入程度越高, 越貼近經驗本身, 也更為真誠坦率, 防衛性較低 (Newman et al., 2003; Pennebaker, 2011); 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 (如, 我們、咱們), 則多用以表徵個體與他人形成的共享認同 (share identity), 在情感聯結上相互依賴, 不再區分你我或內團體外團體, 進而形成一個共同的集合單位 (Chung & Pennebaker, 2007; Karan et al., 2018); 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 (如, 他們、她們), 可用以表徵明確的內外團體分野 (Lee & Lin, 2020; Pennebaker & Chung, 2008)。

依此邏輯, 研究者推論, 婚姻平權法案的反對方, 因為感覺自己的權益受損, 容易產生迴避與防衛心態, 避免自我涉入, 且更強調以伴侶的性別 (異性或同性), 清楚畫分內外團體的界線。這些心理狀態展現在語言標記上, 會呈現較少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迴避經驗, 少自我涉入)、較少的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 (低共享認同) 以及較多的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 (明確的內、外團體分野)。相對而言, 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方, 則更願意貼近經驗, 自我涉入程度更高, 更傾向將所有個體視為共同的集合單位, 使用更多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投入經驗、高自我涉入)、較高的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 (高共享認同) 以及較少的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 (低內、外團體分野)。

(四) 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動機歷程

婚姻平權法案的推動, 象徵著社會正義的實踐, 在世界各國多由代表自由派的政黨或相關社運人士所推動。以臺灣為例, 2006 年由民進黨立法委員蕭美琴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 (立法院院總第 224 號委員提案第 7079 號, 2006); 2012 年由民進黨立委尤美女提出《民法修正版同性婚姻法案》 (立法院院總第 1150 號委員提案第 14506 號, 2012), 其參與同意連署之立法委員, 多為自由派政治人物。這也呼應了過去對政治意識型態 (political ideology) 的研究成果。Lakoff (1996) 以家長和孩子隱喻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保守派 (conservatives) 傾向將政府視為權威與紀律的象徵, 強調權力的動機傾向, 以鞏固相對的權力位階關係; 反之, 自由派 (liberals) 則傾向將政府視為溫暖與關懷的象徵, 更重視平等與他人的利益。以社會支配理論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探討個體的政治型態, 亦發現保守派更認同社會上不同的團體本來就有優劣差異, 優勢群體傾向透過操弄主流價值, 合理化對弱勢團體的不平等待遇 (Pratto et al., 1994)。相對的, 自由派則對新經驗的開放程度更高, 對社會議題和政策採取更友善的態度, 重視眾人的福祉與強化人際聯結。換句話說, 保守派更聚焦於權力關係的鞏固; 自由派則更聚焦於強化人與人的社會聯結。

Fetterman 等人 (2015) 以 LIWC 字詞分析工具, 比較保守派與自由派在權力詞 (power

words，如：階級、權力）與附屬聯繫詞（affiliation words，如：夥伴、共享）上的使用差異，以表徵兩派的動機歷程差異。研究結果發現，相對於保守派，自由派傾向使用較多附屬聯繫詞，較少權力詞。如前所述，臺灣婚姻平權法案的推動過程多為自由派政治人物與社運人士所主導，相對亦受到自由派政黨支持者的力挺。據此，研究者推論，相較於婚姻平權法案的反對方，支持方傾向使用更多附屬聯繫詞，更少權力詞。

（五）多數與少數的說服途徑

由於婚姻平權法案可視為少數群體（同志族群或友善同志族群）向多數群體（異性戀族群）發聲的過程，接下來研究者將進一步探討少數群體與多數群體在說服途徑上的差異，以突顯支持方和反對方在心理歷程上的差異。依據 Moscovici（1980）所提出的轉換理論（conversion theory），多數群體（majority）與少數群體（minority）在說服歷程上，係採取不同的影響途徑。對多數群體而言，傾向採取規範性社會影響（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亦即透過外在團體渴望被多數人所喜愛和接納，進而影響外在團體成員，使其認同多數人主張之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反之，少數群體則多透過訊息性社會影響（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亦即呈現清楚的論述邏輯和內容論點，使多數群體認同其理念和想法（Moscovici & Personnaz, 1980）。當少數群體嘗試發聲，提出不同於多數群體的社會規範時，更會聚焦於內容論點本身，因此呈現較高的認知複雜度，有更多的分析性思考與差異的澄清。

Van Swol 與 Carlson（2015）即以 LIWC 字詞分析工具，檢驗少數與多數群體在說服途徑上的特性差異。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多數群體與少數群體在因果詞的使用數量上，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影響效果方面，則發現當少數群體使用更多的因果詞時，越能影響團體共識決策；反之，在多數群體上則無此一效果。Van Swol 與 Carlson 的研究支持了對少數群體而言，呈現更具有清晰的邏輯與合理的論點，有助其發揮對多數群體的影響力。這也呼應了少數群體在做出不同於多數群體的發聲時，應具更高的認知複雜度。承此論述，研究者推論，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方作為少數群體，在議題的論述表達上，應呈現比反對方更高的認知複雜度。

而在認知運作的字詞指標上，考量到認知複雜度並非只存在因果推論層次，亦存在具體、特定與差異澄清等面向。是故，有別於 Van Swol 與 Carlson（2015）採用單一詞類—因果詞作為指標，本研究改以認知複雜度的複合性計算指標。認知複雜度指標採用 Czechowski 等人（2016）所發展之複合指標，取相異詞（如，差別、反而）、連接詞（如，雖然、並且）、因果詞（如，因為、為什麼）、洞察詞（如，發現、了解）及介系詞（如，和、比）之平均，該指標越高，代表個體的認知複雜度越高。

（六）研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嘗試以字詞分析的角度切入，比較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方與反對方，在特定字詞使用頻率上之差異，以深入瞭解雙方在思考歷程和心理特性之不同。研究一以網路平台之媒體投書與報導內容為分析文本，推論相較於反對方，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方傾向使用更多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附屬聯繫詞及認知複雜度；更少的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與權力詞。研究二改以字詞使用特性，預測公聽會發言人對婚姻平權法案之立場（支持或反對）。研究者推論，當發言人使用越多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附屬聯繫詞及認知複雜度時，越可能是支持方；反之，當發言人使用越多的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和權力詞時，則越可能是反對方。

研究一

（一）研究方法

婚姻平權法案在 2016 年，由尤美女立法委員領銜，正式通過提案門檻，並於 11 月經立法院一讀通過付委，排案審查（立法院院總第 1150 號委員提案第 19706 號，2016）。此案在臺灣社會引

發高度的關注，成為重要的公民議題，也累積了豐富的討論資料。研究一的研究文本聚焦於網路媒體平台的意見投書與報導，主要的原因是有別於個人社群或網誌之心情抒發，發表在網路媒體平台的公開意見投書，通常更具有交流溝通、說服乃至教育的意圖，而非僅一時之慨或轉貼文。因此，其內容通常更為完整，也更清楚且具體地表述其自身看法與原由。

既有的媒體投書與報導之文本蒐集，勢必需要介入投書立場的主觀判斷，才能進行組間的差異分析。本研究具體的文本蒐集工作在 2016 年 12 月間，由不知道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之研究助理，在搜尋引擎以「婚姻平權」、「同志婚姻」、「同性婚姻」、「同性伴侶」等關鍵字，搜尋針對婚姻平權法案之媒體投書與報導。依照搜尋結果之順序，逐篇閱讀內容，先判斷發言人的立場是否明確可區辨為支持或反對，再檢視其文本來源。依序將符合（1）內容可明確判斷發言人對婚姻平權之立場為支持或反對和；（2）同一網路平台以不超過五篇文本為限之原則的網路文本，納入正式分析正本，在支持文本與反對文本各達到三十篇時，即停止蒐集文本工作¹。所有文本資料先經中研院斷詞系統（CKIP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進行斷詞處理（Ma & Chen, 2003），再匯入以 C-LIWC2015 為詞典（林瑋芳等人，2020）的 LIWC2015 程式（Pennebaker, Booth et al., 2015）分析。

（二）研究結果

研究一的文本資料中，平均每篇文本使用 1124.32 ($SD = 666.32$) 個詞，LIWC 的偵測率為 77.32% ($SD = 4.40$)，顯示 LIWC 程式對整體文本具有良好的偵測率。為了檢驗婚姻平權議題上，不同立場者在字詞使用特性上之差異，研究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見表 1），檢驗挺同文本與反同文本在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聯繫詞、權力詞及認知複雜度的使用百分比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反同文本，挺同文本明顯使用更多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 ($M_{\text{挺同}} = 0.64$; $M_{\text{反同}} = 0.34$, $t(1, 57.86) = 2.10$, $p = .04$)。另外在權力詞 ($M_{\text{挺同}} = 5.63$; $M_{\text{反同}} = 6.51$, $t(1, 58) = -1.91$, $p = .06$)、附屬聯繫詞 ($M_{\text{挺同}} = 5.84$; $M_{\text{反同}} = 4.86$, $t(1, 58) = 1.71$, $p = .09$) 及認知複雜度 ($M_{\text{挺同}} = 4.12$; $M_{\text{反同}} = 3.86$, $t(1, 46.16) = 1.71$, $p = .09$) 的差異比較上，亦達臨界顯著，意味著挺同文本中呈現較少權力詞，較多附屬聯繫詞及較高認知複雜度的趨勢。但是在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M_{\text{挺同}} = 1.04$; $M_{\text{反同}} = 0.71$, $t(1, 58) = 1.08$, $p = .28$) 與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 ($M_{\text{挺同}} = 0.35$; $M_{\text{反同}} = 0.44$, $t(1, 45.12) = -.82$, $p = .42$) 的使用頻率上，挺同文本與反同文本則無顯著差異。

表 1
婚姻平權議題之贊成方與反對方的字詞使用差異比較

	挺同文本 ($N = 30$)		反同文本 ($N = 30$)		t 檢定值	效果量 Cohen's d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第一人稱 單數代名詞	1.04	1.39	0.71	0.93	1.08	0.28
第一人稱 複數代名詞	0.64	0.57	0.34	0.54	2.10*	0.54
第三人稱 複數代名詞	0.35	0.29	0.44	0.53	-0.82	0.21
權力詞	5.63	1.59	6.51	1.95	-1.91†	0.49
附屬聯繫詞	5.84	2.03	4.86	2.41	1.71†	0.44
認知複雜度	4.12	0.42	3.86	0.74	1.71†	0.44

† $p < .10$. * $p < .05$.

(三) 討論

研究一以婚姻平權法案相關議題之媒體投書作為研究文本。研究結果大致與假設相符，亦即在相關議題的論述表達上，相較於反對方，支持婚姻平權法案的個體，其內、外團體分野較不明確，共享認同較高（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較多）；在動機歷程上，較受到強化社會關係聯結的所趨動（附屬聯繫詞較多），相對不重視權力關係的鞏固（權力詞較少）；在認知歷程中則呈現更高的認知複雜度（認知複雜度指標較高）。

不過在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與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的結果檢驗中，發現支持方與反對方的使用頻率無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可能的原因在於媒體投書多為自發性的意見表述，無論支持方或反對方，皆有較高程度的自我涉入，也更貼近婚姻平權法案的事件本身，因此在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的使用比例上，無顯著差異。另由於發表在網路媒體平台的公開陳述或投書，通常更具有交流溝通、說服乃至教育的意圖，而非僅一時之慨或轉貼文。因此，其內容通常更為完整，也更清楚且具體地表述其自身看法與原由。故而比起使用「他們」，可能更常以明確的「同性戀」或「同志」等詞彙，來指涉整個同志族體，進而削弱了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的預測效果。

研究二擬依據研究一的結果，以公聽會發言人的特定字詞使用頻率預測其對於婚姻平權方案之立場。研究者同樣關注三類字詞指標，以第一人稱代名詞和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表徵人我界線分野；以動機歷程詞（附屬聯繫詞與權力詞）反映發言人的動機趨力與人際互動歷程；以認知歷程指標（認知複雜度）捕捉發言人之思維特性。

研究二

(一) 研究方法

2016年立法院針對同性婚姻修法議題，分別於11月24日和28日舉辦兩場公聽會，邀請各方學者專家與相關人士表述意見（立法院，2016a，2016b）。由於這兩場公聽會，是婚姻平權法案進入審查程序後，正式由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所召開，更具有社會影響力與代表性。且在公聽會的報告中，發言人皆自願公開表述其對婚姻平權法案之立場，無需立場主觀判斷的介入，適合用以檢驗研究一所發展之語言特徵的檢驗指標。因此，研究二即以這兩場公聽會的發言逐字稿作為分析文本。兩場公聽會與會發言人數共58人，其中力挺同性婚姻法案者30人，反對同性婚姻法案者28人。

研究文本出自立法院第9屆第2會期的「同性婚姻修法」與「同性婚姻法制化」公聽會報告（立法院，2016a，2016b）。文本的整理原則是以「人」為單位，將個人於公聽會之發言內容，整理為每一個發言人單獨一個文本檔案。部份人士有超過1次的發言，則合併在同一個文本檔案中。文本資料處理流程同研究一，先將所有文本資料經過中研院斷詞系統進行斷詞處理，後續再以掛載C-LIWC2015中文詞典之LIWC（2015）程式分析之。

(二) 研究結果

研究二的文本資料中，平均每位發言人講了1368.07（ $SD = 388.90$ ）個詞，LIWC的偵測率為81.09%（ $SD = 4.17$ ），顯示LIWC程式對整體文本具有良好的抓取率。研究二先檢驗支持方與反對方在特定詞類上的使用頻率差異，再以發言人在公聽會的發言內容，預測其對婚姻平權法案之立場（二分變項，0代表不同意，1代表同意），以羅吉斯迴歸分析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檢驗之。

依據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表2），相較於反對方，支持方在言論中使用較多的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 $M_{\text{挺同}} = 1.58$; $M_{\text{反同}} = 1.16$, $t(1, 56) = 2.17$, $p = .03$ ）和附屬聯繫詞（ $M_{\text{挺同}} = 5.84$; $M_{\text{反同}} = 4.97$, $t(1, 56) = 2.11$, $p = .04$ ），也使用較少的權力詞（ $M_{\text{挺同}} = 4.93$; $M_{\text{反同}} = 5.85$, $t(1, 56) = -2.57$, $p = .01$ ）。但是在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M_{\text{挺同}} = 1.92$; $M_{\text{反同}} = 1.55$, $t(1, 45.97) = 1.08$, $p = .19$ ）、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 $M_{\text{挺同}} = 0.64$; $M_{\text{反同}} = 0.44$, $t(1, 56) = 1.37$, $p = .18$ ）及認知複雜度（ $M_{\text{挺同}} = 4.18$; $M_{\text{反同}} = 4.09$, $t(1, 56) = 0.72$, $p = .47$ ）的使用頻率上，支持方與反對方則無顯著差異。研究二之研究結果大致與研

究一相符，僅認知複雜度指標有所出入，研究者在後續的討論中進一步提出可能的解釋。

表 2
公聽會之贊成方與反對方的字詞使用差異比較

	支持方 (<i>N</i> = 30)		反對方 (<i>N</i> = 28)		<i>t</i> 檢定值	效果量 Cohen's <i>d</i>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第一人稱 單數代名詞	1.92	1.34	1.55	0.74	1.32	0.34
第一人稱 複數代名詞	1.58	0.79	1.16	0.69	2.17*	0.57
第三人稱 複數代名詞	0.64	0.68	0.44	0.42	1.37	0.36
權力詞	4.93	1.37	5.85	1.36	-2.57*	0.67
附屬聯繫詞	5.84	1.82	4.97	1.26	2.11*	0.55
認知複雜度	4.18	0.40	4.09	0.49	0.72	0.19

†*p* < .10. **p* < .05.

表 3
以字詞變項預測婚姻平權立場之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

	β	<i>SE</i> (β)	Wald	<i>p</i>	Odds ratio
截距項	-5.95	4.85	1.50	.22	0.00
第一人稱單數代 名詞	0.44	0.35	1.61	.20	1.55
第一人稱複數代 名詞	0.54	0.58	0.88	.35	1.72
第三人稱複數代 名詞	0.80	0.79	1.03	.31	2.22
權力詞	-0.70	0.29	5.86	.02	0.50
附屬聯繫詞	0.59	0.27	4.77	.03	1.80
認知複雜度	1.15	0.88	1.68	.19	3.15

接著改採羅吉斯迴歸，以上述詞類為獨變項，共同預測發言人對婚姻平權法案之立場（表 3）。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迴歸式的解釋力達 40.50%（Nagelkerke R^2 ），預測準確率達 75.86%。表 3 呈現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當發言人使用越多的權力詞時，其所代表之立場為反對婚姻平權的可能性越高（Odds ratio = 0.50, $p = .02$ ）。反之，當發言人使用越多的附屬聯繫詞時，其所代表之立場為贊成婚姻平權的可能性越高（Odds ratio = 1.80, $p = .03$ ）。

（三）討論

研究二以特定字詞使用頻率，檢驗發言人對婚姻平權法案之立場為支持或反對。在獨立樣本 *t* 檢定上，發現贊成方傾向使用更多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與附屬聯繫詞，較少使用權力詞。羅吉斯迴歸檢驗的結果則進一步突顯附屬聯繫詞與權力詞對發言人所持立場之預測效果。整體而言，研究二的結果部份重複驗證研究一之發現，顯示相較於反對方，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方，在伴侶性別之內、外團體的分野較不明顯，傾向將所有個體一視同仁；在動機歷程上更受到強化社會聯結之趨動，積極與他人互動，較不重視鞏固權力關係。唯在認知複雜度的指標上，研究一發現支持方的言論中

明顯有較高的認知複雜度，但在研究二卻發現支持方與反對方在認知複雜度的指標上無明顯差異。對此，研究者認為必須考慮樣本的特殊性。由於在公聽會擔任發言人的個體，多為學者專家或社運相關人士，其在個人背景訓練上，本就具備高度的分析思維能力，且作為公聽會發言代表，發言內容必然先經縝密的思考組織，是以在認知複雜度差異較不明顯，無法作為預測指標。

綜合討論

婚姻平權法案是近年臺灣社會受到高度重視的社會議題，透過全民的積極參與發聲，支持方與反對方雖多有機會交流彼此的想法，目前仍是壁壘分明，彼此的張力持續拉鋸，尚無法形成共識。針對支持方與反對方的衝突磨合，本研究嘗試以字詞分析的角度切入，比較支持方與反對方在思考運作和表達特性上之差異，期能透過提昇對彼此的瞭解，未來雙方都能找到促進有效溝通的方法，進而達到多元平權社會的可能。

本研究從三個角度切入，探討支持方與反對方在人我界線（內、外團體分野）、動機歷程及認知特性上之差異。研究一比較支持方與反對方在媒體投書上之字詞使用差異；研究二則以特定字詞使用頻率，預測發言人對婚姻平權法案之立場為支持或反對。研究結果大致與假設相符，意即相較於反對方，支持方較不以伴侶性別畫分明確的內、外團體，更傾向將所有個體一視同仁；較不重視鞏固既有的權力體制，更容易受到強化社會關係聯結之趨動；在論述表達上，亦呈現較高的認知複雜度。以下將進一步討論本研究的延伸與應用。

（一）從立場有別到心理歷程差異

臺灣社會歷經了三十多年的婚姻平權運動，迄今仍難以達成社會共識。過去許多對於婚姻平權議題的討論，多聚焦在家庭功能、婚姻價值乃至宗教信仰等，卻相對忽略了心理層面的理解。綜合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婚姻平權的反對方，在心態上較趨保守、擔心既有體系結構的安定狀態被瓦解，從而導致相關的權益受損。不論在媒體投書或公聽會的論述，都相對展現出對權力結構的關注。相對而言，支持方則較企盼透過高認知複雜度的論述，與反對方溝通或說服，試圖改變對方的想法進而扭轉其立場，打破人我疆界。顯示出雙方對此議題的基本關切，具有相當大的差異。而未來臺灣社會在婚姻平權的議題上，勢必將隨著同性婚姻的相關法律的實施，再次掀起相關的論爭浪潮。如何避免互不相容的對立撕裂，是值得大家深思的議題。

本研究聚焦於雙方關注焦點與思維特性的差異，固然無法對如何達到有效的溝通提供具體的解方。但研究者認為，在充分認知這些差異的基礎上，有助於提升對彼此歧異點之理解，從而更加展現同理心，化解對方之疑慮。例如，若理解反同方看似高權力聚焦的背後，反映的可能是對既有架構瓦解後，產生之動盪有所顧慮；則挺同方的說服策略，不必然需要一再地提出高認知複雜度的論述，或可考慮更著重於如何在情感面上化解此疑慮。期能透過看見彼此的歧異出發，早日凝聚社會共識。

（二）從人我關係到婚姻平權

過去針對婚姻平權法案的相關研究，多從人口變項，諸如：性別、年齡、宗教信仰等探討個體的態度立場，較少以個體如何看待人我關係的角度切入。本研究嘗試以人稱代名詞的使用頻率反映個體的心理狀態。人稱代名詞是近年備受關注的語言指標，曾用於探討個體的涉入程度、關係認同、階級狀態、聚焦程度及人我界線等（Pennebaker, 2011; Tausczik & Pennebaker, 2010）。在過往的文獻中，人稱代名詞多用於反映個體的關切焦點與涉入程度。其中，第一人稱單數多用於指涉自我涉入程度；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多用於反映共享認同狀態；第二人稱代名詞多用於反映聚焦在互動他人的程度；第三人稱代名詞則用於反映對他人與外團體的聚焦程度。

本研究即以人稱代名詞的使用頻率作為語言標記，表徵個體如何看待異性戀族群與同志族群。其中，越多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反映個體在談論婚姻平權議題的自我投入程度越高；越多的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代表個體越傾向跨越伴侶性別，將異性戀群體和同性戀群體視為共同的團體。

而考量到本研究本研究所選取的文本分別是媒體投書與公聽會發言，在此脈絡下之文本，較少使用第二人稱代名詞，且對於第二人稱代名詞在本研究脈絡下所表徵的心理意涵為何，亦相對較缺乏相關文獻據以推論，故而不納入本研究中。另第三人稱單數代名詞多用於指涉單一他人，而本研究主題為婚姻平權法案立場，作者們關切的是個體如何看待同性戀族群，是將其視為內團體或是外團體，因此採用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作為反映人我界線分野之指標。

研究結果發現，婚姻平權的支持方與反對方在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與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上皆無顯著差異。這很可能是因為願意在婚姻平權議題表達意見和想法的個體，無論支持或反對，皆是高度投入並關切此議題者，自我涉入程度皆高；而在公開平台完整表述個人意見時，比起「他們」，更傾向以「同性戀」或「同志」明確地描述指涉對象，因而減弱了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的預測效果。而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的結果則符合研究假設，即婚姻平權的支持方傾向使用更多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這個結果也呼應了社會認同理論。

依據社會認同理論，當個體以伴侶性別（同性或異性）作為畫分內、外團體的標準時，則異性戀族群可能將婚姻平權法案視為對自身利益的威脅，進而提高內在防衛，捍衛自身權益，鞏固權力關係。反之，倘若個體偏向將所有個體，不論伴侶性別為同性或異性，皆視為一個更大的群體時，則容易形成共享認同，將婚姻視為所有人共同的基本權益。是故，個體如何看待異性戀族群與同志族群彼此間的關係，很可能影響其對婚姻平權法案的立場。此研究結果，也呼應了過去心理學領域探討人我關係的研究結果。

個體如何看待人我關係，不僅影響其行為反應，也能夠進一步預測其心理適應與關係品質。Crocker 與 Canevello (2012) 提出生態動機系統 (ecosystem motivation) 與個我動機系統 (egosity motivation)，探討個體如何看到自我和他人的關係。生態系統動機是以生態系統比喻人與人之間彼此緊密相連息息相關，任何人的行為或是動作都會彼此互相影響，最後反饋到整個系統中，牽一髮而動全身。在這樣的觀點之中，個人會將他人的需要納入考量，因為那也關乎自己和整個系統，自我與他人之間存在著非零和 (non-zero-sum) 的關係，而更傾向以互相合作的方式，創造整個系統最大的利益。相對的，持個我系統動機的個體，則認為人與人之間是彼此競爭求勝的，一人的成功獲益便是另一人的失敗損失，因而強烈地想要鞏固自己的資源，重視自我的需求遠勝於其他人的，傾向將他人視為自己追求目標的阻礙或是達成目的的手段。

如以生態系統動機與個我系統動機作為理論架構，亦可進一步理解婚姻平權法案之支持方與反對方的動機歷程。零和信念是區分生態系統動機與個我系統動機很重要的指標。正因為反對方傾向認為以婚姻保障同性伴侶之權益，即會損及自身權益；亦即給外團體資源，就是對內團體造成傷害，因而更容易激發保護資源的捍衛心態，從而更強化內、外團體的分野，將同志族群視為非我族類，展現個我動機系統的特色。反之，支持方則可能更傾向生態系統動機，主張人與人都都是緊密相連，形成一個更大的生態系統，同志族群與異性戀族群，都是這個生態系統的一份子，不以伴侶的性別區分內團體或外團體，也更支持以婚姻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權益。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婚姻平權法案之支持方與反對方，在人我動機系統上的差異，期能更深入瞭解雙方的立場差異，從而促進有效溝通，形成共識。

(三) 以字詞使用頻率作為語言標記

同志議題，在臺灣社會是敏感又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在早期保守的社會風氣下，同性戀諱莫如深，同志權益自是深藏暗櫃的禁忌話題。近年來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人權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人積極投入相關議題的討論，各自發聲。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底下，不同於問卷調查，以字詞使用頻率作為語言指標，可更貼近語言使用者內在自動化的歷程反應，貼近使用者真實的內在運作歷程，反映個體對婚姻平權議題真實的立場。就研究者所知，本研究是第一個以字詞分析研究取向切入，從人我關係、動機歷程及認知特性三個層次，比較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方與反對方之差異。未來研究亦可將本研究的發現延伸至不同的社會議題，例如死刑存廢、非核家園等，進一步比較支持方與

反對方在心理特性上之差異。

(四) 性別平權教育的省思

婚姻平權運動在臺灣推動數十年以來，民間團體積極串連推動，付出了許多努力，從媒體投書、工作坊、遊行到公聽會等，不斷地爭取社會曝光，試圖建立性別平權的觀念，並且澄清各種誤解迷思。教育部也在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正式納入課綱，涵蓋同志教育、性教育及情感教育等概念，以破除錯誤的迷思，培養學童性別意識與平權觀念。然而，2018 年的公投，似乎宣告了性平教育的挫敗。顯示社會多數人的立場，仍是對於同性戀充滿誤解，對於立法保障同婚權利，仍有許多爭議和排斥。Ko 等人 (2020) 的研究探討臺灣婚姻平權公投前後，非異性戀族群感受到的不友善態度與自殺意念。其研究結果發現，在婚姻平權公投後，非異性戀族群明顯感受到更多的不友善態度，且正向預測其自殺意念。顯示社會環境的反同風氣，確實對非異性戀族群的身心適應具有不良影響。

本研究的發現也呼應公投結果，即反同婚者的言語文字表達間反映了人我界線分明、保守派思維與多數者的心態。反同者傾向把異性戀視為自然、正常與理所當然的，非異性戀者都是異常、負面的。為了保護既有結構，他們需要且有權力將非異性戀者排拒於現有體制中。而且，這個想法是理所當然，不需要詳細論述與說服，因為改變將自然導致既有各種安定結構的瓦解與災難。因此，面對婚姻平權法案的推動，反同團體投入大量人力倡議維護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與反對性平教育。在王維邦與陳美華 (2017) 的研究，也可觀察到，儘管有越來越多臺灣民眾對於同性戀者也應該享有結婚的權力，持贊成立場；但約有半數的民眾對於同性戀伴侶能否把小孩教養好，仍是抱持負面的態度。故而家長團體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在街頭宣導。他們從家庭結構瓦解、親屬稱謂混亂乃至課本鼓吹變裝癖和變性、性平教育將成為同志養成教育、等等聳動的議題包裝，使得不只保守派、宗教人士、甚至許多家長感受到傳統價值式微的擔憂，對於同性婚姻與性平教育都抱持更深的疑慮。

面對這些反對的聲浪，固然從婚姻平權的立場視之，多數是錯誤的斷章取義和以訛傳訛。然若從反同者的立場視之，卻是真切對於家庭結構瓦解的擔憂和焦慮，進而驅使其做出捍衛傳統家庭價值的自主行動。未來更切實的討論或許是順著反同方對於家庭的重視，對比家庭結構與家庭功能的重要性，才能讓不同類型家庭都被看到，也都有良好運作的空間。

對於如何持續推動婚姻平權的立場，落實社會正義的價值？依據本研究探討挺同者和反同者在婚姻平權立場的心理歷程差異之研究結果，一個可能的執行方向即是從性別教育著手。幫助民眾正確地瞭解性別氣質、性別認同及性取向等概念，從而減少對同志團體的歧視和污名化。舉例來說，近年來性別平權團體戮力提倡更改具特定性別標籤的語彙，例如將空姐改稱為空服員，將保母改稱為保育員，主張以中性職業稱謂有助於落實性別平權，避免形成性別偏見和歧視。Tavits 與 Perez (2019) 以實徵研究證據支持此一論述。他們請研究參者分別以瑞典文中的「男性他 *han*」、「女性她 *hon*」或「中性他 *hen*」來描述一張無明顯性別特徵的圖片。研究結果發現，中性他組別的研究參與者對女性和 LGBT 群體有較正面的態度。Tavits 與 Perez 的研究顯示確實可能透過人稱代名詞的操弄作業，影響個體的態度，進而促進性別平權。建議未來研究可延伸 Tavits 與 Perez 操弄代名詞的方法，結合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嘗試發展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相關的操弄作業，檢驗能否弱化異性戀和同性戀的界線，進一步提升其對婚姻平權的支持程度。

(五)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透過兩個研究，以字詞分析研究取向，探討婚姻平權法案之支持方與反對方在人我關係、動機歷程及思維特性上之差異。整體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相符，但仍有部份研究限制需要注意。首先，研究一與研究二所採取與研究文本，皆為公開表述資料，對話對象並非單一個體，溝通模式也與一般人際互動中，說者與聽者一來一往的互動模式有所出入。未來研究可透過實驗室情境操作，邀請支持方與反對方直接溝通討論，分析其語言特性，以檢驗效果的穩定性；再者，本研究的參與者，無論研究一的媒體投書人或研究二的公聽會發言人，皆為高度關注婚姻平權法案之個體，對此議題較為熟悉，掌握程度也較高。對於研究結果能否推論至一般大眾樣本，尚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檢驗之。

經過漫長的努力，婚姻平權法案的推動在臺灣已經得到初步的成果，在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獲得基本保障。然而，法律的修訂僅是最低限度保障同志族群的結婚權利，如何從整體社會風氣的調整轉變，去除對同志的負向標籤，減少歧視和排擠，建立一個真正多元平等的社會，仍有待社會大眾共同的努力。期能透過本研究拋磚引玉，從人我關係、動機歷程及思維特性的角度，嘗試理解支持方與反對方的歧異，因瞭解而更能有效對話溝通，早日實踐真正平等的社會正義。

註釋

¹ 研究一的文本來源，皆出於在媒體投書或網路平台報導之婚姻平權法案相關論述。其中支持文本 30 篇，來源涵蓋關鍵評論網、美麗島電子報、商業週刊、端傳媒、ETtoday、報導者、公民行動資料庫、天下獨立評論、風傳媒、yahoo 奇摩、聯合新聞及想想論壇；反對文本 30 篇，來源涵蓋 ETtoday、上報、中時、下一代幸福聯盟、明光社、風向新聞、風傳媒、基督教今日報、獨立媒體、蘋果日報及護家盟。

參考文獻

- 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民國 106 年 5 月 24 日院台大二字第 1060014008 號）（2017 年 5 月 24 日）。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48>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748. (2017, May 24). <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48>]
- 中央選舉委員會（2018）：〈全國性公民投票案〉。<https://web.cec.gov.tw/upload/file/2018-11-09/ad9a3c4c-82a4-4d77-b3e5-d234d830f514/3fcff04246193159fea3fa8365dcd915.pdf>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8). *National referendums*. <https://web.cec.gov.tw/upload/file/2018-11-09/ad9a3c4c-82a4-4d77-b3e5-d234d830f514/3fcff04246193159fea3fa8365dcd915.pdf>]
- 王維邦、陳美華（2017）：〈非常規性實踐的性別化態度：男「性」特權、性別階分工與婚家體制的角色〉。《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0，53–105。[Wang, W.-P., & Chen, M.-H. (2017). Gendered attitudes toward non-conforming sexual practices in Taiwan: The impacts of male sexual privileges,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familism.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40, 53–105.] <https://doi.org/10.6255/JWGS.2017.40.53>
- 王櫻芬、黃瑛琪、陳宛宜（2019）：〈青少年案主觀點的諮商關係體驗～初探性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0（4），659–683。[Wang, Y.-F., Huang, Y.-C., & Chen, W.-Y. (2019). Adolescent clients' perception of the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An initial qualitative analysis from the client perspectiv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0(4), 659–683.] [https://doi.org/10.6251/BEP.201906_50\(4\).0005](https://doi.org/10.6251/BEP.201906_50(4).0005)
- 民法（2021 年 1 月 20 日）修正公布。<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00001> [Civil Code. (2021, Jan 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00001>]
- 立法院（2016a）：〈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舉行「同性婚姻修法」公聽會紀錄〉。《立法院公報》，105（95），197–254。[The Legislative Yuan. (2016a). The public hearing on the amendment of Same-Sex Marriage. *The Legislative Yuan Gazette*, 105(95), 197–254.]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5/95/LCIDC01_1059501_00003.pdf
- 立法院（2016b）：〈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舉行「同性婚姻法制化」公聽會紀錄〉。

-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4(S), 411–431.] <https://doi.org/10.6251/BEP.20110524>
- 陳湘芸、許維素（2020）：〈焦點解決團體諮商對未婚成年女性愛情分手失落調適之輔導效果〉。《教育心理學報》，52（1），139–162。[Chen, H.-Y., & Hsu, W.-S. (2020). The effects of solution-focused group counseling on break-up adjustment of unmarried adult female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1), 139–162.] [https://doi.org/10.6251/BEP.202009_52\(1\).0006](https://doi.org/10.6251/BEP.202009_52(1).0006)
- 曾怡茹、林正昌（2015）：〈從禪坐者之身心體驗重新理解高峰經驗〉。《教育心理學報》，47（2），179–198。[Tzeng, Y.-R., & Lin, C.-C. (2015). To re-understand peak-experience base on Zen meditation experienc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7(2), 179–198.] <https://doi.org/10.6251/BEP.20141225>
- 黃金蘭、Chung, C. K.、Hui, N.、林以正、謝亦泰、Lam, B. C. P.、程威銓、Bond, M. H.、Pennebaker, J. W.（2012）：〈中文版語文探索與字詞計算字典之建立〉。《中華心理學刊》，54，185–201。[Huang, C.-L., Chung, C. K., Hui, N., Lin, Y.-C., Seih, Y.-T., Lan, B. C. P., Cheng, W.-C., Bond, M. H., & Pennebaker, J. W. (2012).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4, 185–201.] <https://doi.org/10.6129/CJP.2012.5402.04>
- 葉德蘭（2017）：〈良言傷人，六月亦寒：台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探析〉。《考古人類學刊》，86，69–110。[Yeh, T.-D. (2017). Good words hurt too: The cyberdiscourse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6, 69–110.] <https://doi.org/10.6152/jaa.2017.6.0004>
- 葉寶玲、陳秉華、陳盈君、蔡毅樺（2010）：〈《教育心理學報》四十年（1967–2007）之內容分析〉。《教育心理學報》，41（3），685–702。[Yeh, P.-L., Chen, P.-H., Chen, Y.-C., & Tsai, Y.-H. (2010). A 40-year content analysis of research in th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67–2007).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1(3), 685–702.] <https://doi.org/10.6251/BEP.20090701>
- 翟海源（1999）：〈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1991 第二期第二次：家庭、教育組（C00003_1）【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https://doi.org/10.6141/TW-SRDA-C00003_1-1 [Chiu, H.-Y. (1999). 1991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Round 2, Year 2): Family, education (C00003_1) [data file]. Available from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https://doi.org/10.6141/TW-SRDA-C00003_1-1]
- Cheng, Y.-h., Wu, F.-C. F., & Adamczyk, A. (2016).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1995–2012.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 317–345.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16.1199257>
- Chung, C. K., & Pennebaker, J. W. (2007). The psychological function of function words. In K. Fiedler (Ed.), *Social communication: Frontiers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343–359). Psychology Press.
- Crocker, J., & Canevello, A. (2012). Consequences of self-image and compassionate goals. In D. Patricia & P. Ashby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5, pp. 229–277). Elsevier.
- Fetterman, A. K., Boyd, R. L., & Robinson, M. D. (2015). Power versus affiliation in political ideology: Robust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distinct motivation-related signatur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 1195–1206.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5591960>

- Graybeal, A., Sexton, J. D., & Pennebaker, J. W. (2002). The role of story-making in disclosure writing: The psychometrics of narrative. *Psychology and Health, 17*, 571–581. <https://doi.org/10.1080/08870440290025786>
- Hartley, J., Pennebaker, J. W., & Fox, C. (2003). Abstracts, introductions and discussions: How far do they differ in style? *Scientometrics, 57*, 389–398. <https://doi.org/10.1023/A:1025008802657>
- Herek, G. M., & McLemore, K. A. (2013). Sexual prejudi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4*, 309–333.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113011-143826>
- Jowett, A. (2014). ‘But if you legalise same-sex marriage...’: Arguments against marriage equality in the British press. *Feminism & Psychology, 24*, 37–55. <https://doi.org/10.1177/0959353513510655>
- Karan, A., Rosenthal, R., & Robbins, M. L. (2019). Meta-analytic evidence that we-talk predicts 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 functioning in romantic coupl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6*, 2624–2651.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18795336>
- Ko, N.-Y., Lin, I.-H., Huang, Y.-T., Chen, M.-H., Lu, W.-H., & Yen, C.-F. (2020). Associations of perceived socially unfavorable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same-sex marriage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Taiwanese people before and after same-sex marriage referendu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3), Article 104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031047>
- Lakoff, G. (1996). *Mor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 I.-C., & Lin, W.-F. (2020). Us versus Them: The debates on the legisl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1994–2015) in Taiwa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80/00918369.2020.1848148>
- Loftus, J. (2001). America’s liberalization in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1973 to 199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762–782. <https://doi.org/10.2307/3088957>
- Ma, W.-Y., & Chen, K.-J. (2003). Introduction to CKIP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system for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bakeoff.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SIGHAN Workshop on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17*, 168–171. <https://doi.org/10.3115/1119250.1119276>
- MacDonald, A. P., Huggins, J., Young, S., & Swanson, R. A. (1973).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Preservation of sex morality or the double standard?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0*, 161–161. <https://doi.org/10.1037/h0033943>
- Moscovici, S. (1980). Toward a theory of conversion behavior.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pp. 209–239). Academic Press.
- Moscovici, S., & Personnaz, B. (1980). Studies in social influence: V. Minority influence and conversion behavior in a perceptual tas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6*, 270–282. [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80\)90070-0](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80)90070-0)
- Newman, M. L., Pennebaker, J. W., Berry, D. S., & Richards, J. M. (2003). Lying words: Predicting deception from linguistic styl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665–675.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3029005010>

- Pennebaker, J. W. (2011). *The secret life of pronouns: What our words say about us*. Bloomsbury Press.
- Pennebaker, J. W., Booth R. J., Boyd, R. L., & Francis, M. E. (2015).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2015*. Pennebaker Conglomerates. <https://www.LIWC.net>
- Pennebaker, J. W., Boyd, R. L., Jordan, K., & Blackburn, K. (2015). *Th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LIWC2015*.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https://doi.org/10.15781/T29G6Z>
- Pennebaker, J. W., & Chung, C. K. (2008). Computerized text analysis of Al-Qaeda transcripts. In K. Krippendorff & M. Bock (Eds.), *A content analysis reader* (Vol. 453465, pp. 453–466). Thousand Oaks.
- Pennebaker, J. W., & Francis, M. E. (1996).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language processes in disclosure. *Cognition and Emotion, 10*, 601–626.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96380079>
- Pennebaker, J. W., Mehl, M. R., & Niederhoffer, K. G. (2003).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natural language use: Our words, our sel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547–57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4.101601.145041>
- Pratto, F., Sidanius, J., Stallworth, L. M., & Malle, B. F. (1994).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 personality variable predic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741–76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7.4.741>
- Schmitt, M. T., Lehmler, J. J., & Walsh, A. L. (2007). The role of heterosexual identity threat in differential support for same-sex “Civil Unions” versus “Marriage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0*, 443–455.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07081534>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 W.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2nd ed., pp. 7–24). Nelson-Hall.
- Tausczik, Y. R., & Pennebaker, J. W. (2010). The psychological meaning of words: LIWC and computerized text analysis method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 24–54. <https://doi.org/10.1177/0261927X09351676>
- Tavits, M., & Perez, E. O. (2019). Language influences mass opinion toward gender and LGBT equ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6*, 16781–16786. <https://doi.org/10.1073/pnas.1908156116>
- Van Swol, L. M., & Carlson, C. L. (2015). Language use and influence among minority, majority, and homogeneous group membe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4*, 512–529.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5570658>
- Weinberger, L. E., & Millham, J. (1979). Attitudinal homophobia and support of traditional sex rol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 237–246. https://doi.org/10.1300/J082v04n03_02

收稿日期：2020年04月14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0年09月04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0年10月13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0年11月10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0年12月09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12月09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1, 53(1), 109–126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 O. C.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Approach

Wei-Fang L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hin-Lan Huang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Ching Le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spite being the first Asian country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same-sex marriage continues to be controversial in Taiwanese society. Extensive research has attempted to explain attitudes toward same-sex marriage on the basis of religion, gender, and stereotypes. Few studies, however, have focu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We adopted the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 method to examine th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amps. The LIWC method was developed by Pennebaker and his research team and has since become a widely used computer-aided text-analysis method. The essential assumption of the LIWC method is that word usage in certain categories serves as a language marker that reflects an individual's focuses, thoughts, feeling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Given that same-sex marriage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aiwan's society, individuals may feel pressured to truly express their attitudes and thoughts. An advantage of the LIWC method is that it ignores context; only word count is used for indices, which could help reveal individuals' inn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The present research used language markers to understand individuals' self-other boundaries, motivation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We argue that op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have a clear self-other boundary; they view heterosexual individuals as an ingroup, and non-heterosexual individuals, an outgroup. Accordingly, we hypothesized that relative to proponents, opponents tend to use fewer first-person singular and plural pronouns (indicating less self-involvement and shared identity, respectively) and more third-person plural pronouns (indicating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heterosexuality and non-heterosexuality) when discussing topics involving same-sex marriage. Second, we analyzed the motivations of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Previous studies of political ideology have revealed that those holding liberal views emphasize affiliation whereas those with conservative views emphasize power. Those with conservative views tend to perceive the government as an authoritarian and disciplinary parent; they want to preserve the current power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that favors individuals who identify as heterosexual. Because it is primarily those holding liberal social views that promote the legisl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we hypothesized and found that proponents would tend to use more affiliation-oriented words and that opponents would tend to use more power-oriented words when discussing same-sex marriage. Lastly, we attempted to differentiate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Previous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the majority and minority practice disparate methods of persuasion. The majority influence others through 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 which induces people to conform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accepted and are fearful of violating group norms. By contrast, the minority influence others through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 which changes people's beliefs and behaviors by convincing them that the minority have

accurate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expected to be carefully analyzed, to serve this purpose, well-reasoned and logically consistent arguments are crucial. Therefore, we hypothesized that proponents, as the minority, tend to demonstrate more cognitive complexity in their arguments regarding same-sex marriage.

We conducted two studies to test our hypotheses. In Study 1, we analyzed opinions expressed in newspapers and online media. We collected 60 articles with an equal number of opinions written by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camps. All text files were processed using the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Chines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KIP) group and subsequently analyzed using the LIWC2015 application and C-LIWC2015 dictionary. The average word count of the text files used in Study 1 was 1124.32 ($SD = 666.32$), and the LIWC detection rate was 77.32% ($SD = 4.40$). We performed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s to examine our hypotheses and discovered that, relative to opponents, proponents tended to use more first-person plural pronouns and affiliation-oriented words but fewer power-oriented words; their written opinions also exhibited higher cognitive complexity.

In Study 2, we examined whether word usage characteristics identified for the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in Study 1 could predict an individual's attitude (pro or against) toward same-sex marriage. The data were drawn from the transcripts of two public hearings held by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in 2016. All transcripts were processed in the same way as in Study 1. The average word count of the transcripts used in Study 2 was 1368.07 ($SD = 388.90$), and the LIWC detection rate of the transcripts was 81.09% ($SD = 4.17$).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s in Study 2 yielded similar results to that in Study 1. Relative to opponents, proponents tended to use more first-person plural pronouns and affiliation-oriented words but fewer power-oriented word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complexity was observed between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We suspect that the speakers at the public hearing were experts and therefore capable of giving well-prepared speeche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a logistic regression indicated that individuals who used more affiliation-oriented words were more likely to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By contrast, individuals who used more power-oriented words were more likely to oppose same-sex marriage.

The findings from Studies 1 and 2 highlight th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Specifically, the proponents tended to express a shared identity and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social connections than the opponents; they also demonstrated higher cognitive complexity in their written opinions. The opponents, tended to use power and status words than the proponents.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we offer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camps, so social equality in the near future may be achieved. First,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amps is the first step for better communication. The underlying concern of the opponents is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may be detrimental to the exist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traditional family functions. Thus, for the proponents to have their messages heard by the opponents, it may be better to address the opponents' negative feelings rather than well-formulated reasons. Second,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even though the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ct was implemented in 2004 in Taiwan, gender and sexual minorities - still face substantial prejudice in our society, which may be detrimental to thei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programs dispelling preconceptions regarding homosexuality and improv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sexual identities may be most valuable to tackle such prejudice. Third,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a linguistic method such as LIWC can be applied to study controversial social topics. Unlike self-report measurements, which would be prone to social desirability, the frequency of word usage serving as a language marker is hard to manipulate and may reflect individuals' inner processes. Future studies can apply LIWC to examine th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of other controversial social issues such as abortion or the death penalty.

In summary, we applied a linguistic method to clarify th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in terms of their self-other boundaries, motivations, and cognitive complexity. Future studies can exp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to further gender and marriage equality objectives.

Keywords: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 same-sex marriage, motivation, cognitive process